

论历史与人民“四个选择”的历史经纬

王 刚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思想、政治、制度和国策上面临着诸多选择,由于农民阶级不会走、地主阶级不愿走、资产阶级不能走、帝国主义不让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使历史和人民在指导思想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组织上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选择了社会主义、在国策上选择了改革开放。“四个选择”是在双向互动中进行的,是相互贯通、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 历史和人民 四个选择 逻辑进路

王 刚,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210023

“四个选择”是指“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1]。在这个命题中,“历史和人民选择”是拟人化的提法,实际上是说近代以来在中国哪种力量最终胜出。那么,历史和人民为什么要进行这“四个选择”?历史和人民是怎样进行这“四个选择”的?选择了“四个选择”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本文拟就选择的历史与历史的选择,谈谈“四个选择”的历史经纬。

一、历史和人民何以需要“重新选择”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没有面临“重新选择”。因为,中华民族曾经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经济、科技、文化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中,期间虽然也经历过朝代的变更、皇权的轮换以及相应而来的社会动荡,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组织力量以及基本国策等方面都不存在进行重新选择的急迫危机。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上,汉朝以后,传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与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三教合流”,不仅是统治中国的思想基础,而且还巩固了封建专制统治。在政治制度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帝制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循环,朝代的更替并没有引发真正意义上政治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研究”(项目编号:14MLA002)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制度危机,乃至新的朝代大多沿袭了前一朝代的制度,从而使政治制度得以延续。在组织力量上,近代以前,中国社会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虽然统治阶级内部有朋党之间争斗,但它所改变的只是权力在不同朋党之间的分配,并没有改变封建统治阶级的性质,其统治地位也没有受到严重威胁。在基本国策上,虽然中国古代很重视对外交往,如张骞出使西域,鉴真六次东渡,郑和七下西洋,但满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国日益走向闭塞。因此,近代以前,由于“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1],这使得中国封建社会以超稳定的特征避免了思想、制度、政治和国策的危机发生。

但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在这里,就连一场激烈爆发的起义也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2]这使其在思想、制度、政治和国策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首先,西学东渐冲击和动摇了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传统儒家思想暴露出其不合近世潮流的破绽并在与建立在发达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近代西方文化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其次,近代制度文明的传入,使中国两千多年连贯而稳定的封建制度架构危机不断。第三,随着新生产力要素的出现,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3]。一部分地主将土地剥削获得的货币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使地主阶级本身发生了某些变化;19世纪40、50年代,中国出现了最早的工人阶级,60、70年代,又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向封建统治阶级发起了有力的挑战。第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腐朽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再也难以为继,不得不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开放”。对此,马克思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4]。这些改变最终成为思想、制度、政治和国策危机的根源,“重新选择”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选择的历史:历史和人民选择的逻辑进程

鸦片战争后,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制度、政治和国策上的四重危机,这四重危机促使中国人首先将目光投向西方,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到富强的真理,从师夷派、洋务派、维新派到革命派,前赴后继奋斗半个多世纪,都企望中国步西方列强后尘,参考或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先选择资本主义作为实现中国富强的目标。那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命运如何呢?

第一,农民阶级不会走。农民阶级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由其本身局限性决定的。首先,在经济上,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者,目光狭隘,不能建立适应自己的经济基础。其次,在政治上,农民阶级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封建制度。再次,在思想上,农民阶级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皇权主义、等级制度。

第二,地主阶级不愿走。地主阶级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出于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地主阶级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让位于其他阶级,为了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虽然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知识分子,力图在不改变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这也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需要。然而,由于地主阶级企图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制度,这就使它既摆脱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也摆脱不

[1][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0页,第608页。

[3]齐卫平:《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三个选择”问题的若干思考》,〔北京〕《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1期。

了本国封建主义顽固势力的阻挠和侵蚀,从而使引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资产阶级不能走。资产阶级本应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却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方案不符合中国国情以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既没有力量引发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力量彻底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罗网,他们所选择的这些理论武器“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1],不仅无法根本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无法改变中国向半殖民地社会沉沦的命运。此外,中国资产阶级自身具有局限性,尤其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2],使得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生存和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无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四,帝国主义不让走。帝国主义不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为了控制和奴役中国。鸦片战争后,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想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3]它们的目的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国。

第五,无产阶级不走了。无产阶级不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无产阶级要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历史对各阶级及其政治势力都给予了充分的表现机会。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都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最终都没有成功,改造中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而且还具有中国无产阶级独特的优点和特点,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造就出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便有了以科学理论为行动指南的,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先进政党的指导,从此,中国新的出路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从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阶级的新道路。

三、历史的选择:“四个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日渐沦为一个受到列强欺辱,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因此,哪种思想能够对这两大历史任务作出成功应对,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哪条道路能够指引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它就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领导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哪种国策能够推进两大历史任务的完成,它就能够符合民心,能够顺应时代潮流。

第一,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鸦片战争以后,神州大地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许多仁人志士纷纷放眼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学说也传播到中国。当时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五花八门的西方“主义”,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施蒂纳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那么,在众多的“主义”中,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其他“主义”所没有的独特的思想力量。这种独特的思想力量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实的理论、时代的理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理论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和改造中国的理论,她能够提供中国人民解决中国历史任务的思想武器,所以,中国人民经过学习、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之前,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不是封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不行,因为封建文化与反封建的历史走向相悖逆;而学习资本主义,又走进了死胡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摸索和奋斗的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左右碰壁的中国知识分子发现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三种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极为特殊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它证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1],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自己走向解放,这确实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由于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历史方向的正确选择。三是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3],即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鸦片战争以后,反帝反封建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双重诉求。既然反帝反封建是近现代中国最为紧迫的双重诉求,那么,这一新诉求必然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思想的试金石。业已腐朽的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已与反封建的历史走向相悖逆;原本具有反封建文化功能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它却因殖民主义的需要而与封建文化结成了反动同盟,并且,帝国主义用枪炮战舰强行“送”到中国来的西方思想,根本不可能具有反帝救国的功能^[4]。毛泽东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5]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二,时代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势颓败,反动保守势力异常强大,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两大历史任务规定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决定着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历史地位: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领导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否则,将被历史和人民所淘汰。然而,“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6]因此,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到抗击西方列强的义和团运动;从封建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历史表明,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勇敢地担负起带领中国

[1]《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第1514页。

[4]蔡林慧:《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之缘由探析》,〔南京〕《唯实》2003年第1期。

[6]《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1页。

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9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1],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二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中国人民长期的历史比较选择。这种“历史比较”,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就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反封建方面,中国共产党抓住土地所有制这个核心问题,先后实行了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彻底的土地改革等政策,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把中国大多数民众争取到自己的身边,而国民党直到逃离大陆前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反帝方面,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先是“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后的妥协退让,然后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抵抗,最后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反帝立场一变再变。而中国共产党则转变策略,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敌后抗日战场,从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种“历史比较”,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是否继续坚定地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执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在发展进程中走过一段弯路甚至出现过“文革”这样的严重失误,但中国共产党能够敢于并善于纠正自身的错误,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维护国家利益和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难怪美国《时代》周刊评论称:“在中国,人民认为共产党政权创造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惊人的经济增长。经济危机期间,就在其他国家遭受重创之时,中国继续前行。为什么要把共产党赶下台呢?没几个中国人愿意冒险制造阿拉伯式的混乱。”^[2]三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成为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根本原因。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们党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的政党,同样,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人民为什么还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先进性。然而,“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3]。只从历史上认同还不够,中国共产党要得到中国人民的始终如一的认同,还需要有更多更好的执政成就,唯有如此,才能继续获得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三,实践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是选择取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鸦片战争后,面对思想、政治、制度上的危机,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比较,在思想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力求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愿望,为中国社会发展确立精神支柱和伟大旗帜;在政治上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力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未来的愿望,为中国社会发展确立了领导核心和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产物的中国共产党,就必然选择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自然就在制度上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力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新生活的愿望,为中国社会发展确立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基础。二是现实需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四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即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2]江上雨:《中国不是中东》,〔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3-10,第1版。

[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7页。

封建主义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第一种建国方案的代表者是地主阶级,他们妄图在中国继续实行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制度,继续走封建主义道路。由于辛亥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王朝轮替的历史走向,此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所以,这种建国方案行不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张勋复辟很快就彻底失败证明了这一点。第二种建国方案的代表者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他们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最终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三种建国方案的代表者是某些中间党派的领袖人物或中间人士,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政治主张在抗战胜利后一度影响很大,当时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居于中间势力的“民盟”处于调停国共两党的核心地位,正如当时罗隆基所说:“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2],但由于自身组织松懈,党内有党,主义多歧,在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上软弱无力,无所作为,最终未能把握住这一历史赋予的千载难逢的契机。随后,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其总部也被迫宣布解散。因此,这种建国主张不仅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就是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多数也在实际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之上,承认了共产党的领导。第四种建国方案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建国方案,由于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胜利,最终赢得了全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真诚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如何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怎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呢?从世界历史上看,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欧美和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另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前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那么中国走哪条道路呢?对此,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3]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无法形成独立、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果独立以后的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就必然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难以取得经济上的真正独立。而且,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社会将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将继续遭受剥削和压迫,而且意味着广大农民也将失去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胜利果实,大量手工业者也将走向破产,这是翻了身的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4]。所以,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仍然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向繁荣富强,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发展选择了改革开放。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主要是基于三重诉求:

一是内部诉求: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左”的思潮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之后,虽然有像郑州会议(二次)、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那样的纠“左”努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左”的问题,以至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对此,邓小平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5]。面对这种政治经济状况,我们该怎么办?“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就会葬送我国的现代化事

[1]《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7页。

[2]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3]《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4]沙健孙:《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1]二是外部诉求:“文革”结束后,中外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反差。改革开放以后,当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感到中国已经被世界甩在了后面。20世纪50年代中叶,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对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2]但是,20世纪60-70年代,当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时,各国都在利用这一机遇,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而我们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其结果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地拉大了。正是在总结十年内乱惨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切感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上的反差,痛定思痛,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3]三是时代诉求:时代主题转换给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提出的新课题。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当时就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4]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中国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5]。对此,胡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没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没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6]。

四、结 论

第一,“四个选择”是在双向互动中进行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也选择了中国人民。正是在双向互动中,历史和人民不断地进行选择,马克思主义才不断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才不断保持先进性,社会主义道路才越走越宽广,改革开放才不断深入发展。

第二,“四个选择”相互贯通,密不可分。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选择改革开放。

第三,“四个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和人民做出了“四个选择”,但“四个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都存在一个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旗帜树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改革开放进行了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有不断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有如何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模式问题,改革开放有不断深入发展问题。在“四个选择”中,马克思主义是基础,是旗帜,如果指导思想发生了偏离,就会影响党的先进性,就会影响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因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改革开放,只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找到了思想、制度、政治组织和发展方向上的保障,而要真正实现这种保障的作用,则还需要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唯有如此,才能使“四个选择”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史拴拴]

[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8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第242页。

[5]曹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北京〕《学习时报》2008年10月12日。

[6]《胡绳全书》第3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4页。